

机遇·依附·危机

——台湾经济发展的剖析

张有年

战后台湾经济为什么能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怎样正确评价台湾经济发展的得失？这是一个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台湾经济发展的本质，现着重阐述以下三个问题。

发展与机遇的关系

机遇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台湾经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具有独特的机遇。

首先，是历史的机遇，这是指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物质基础。日本侵占台湾长达半个世纪，日本殖民者出于政治统治及经济掠夺的目的，不得不进行一些开发工作。日本长期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政策，一直重视台湾农业的发展，因而使台湾的“米糖”经济达到较高的水平。1939年，台湾的稻米产量达到了131万吨，蔗糖产量达到了142万吨。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日本又投资于电力和基本工业，加快铁路、公路、港湾和机场的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从东南亚各国掠夺来的原料大量运到台湾，在岛内发展了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使燃料、化工、煤炭和钢铁等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1939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达5.776亿日元，超过了农业，居于首位。这些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确在战争中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但战后经过努力，很快得到恢复。这一基础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现实的机遇，这是指美、日等国，主要是美国的扶持。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力图建立世界霸权，对新中国的成立极为仇视，为了建立对新中国的包围圈，长时期来，竭力扶持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台湾。70年代中美建交以后，仍然继续插手台湾事务。这一切给台湾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契机。

1. 资金的援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自远东战略的考虑，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随即恢复了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在10多年时间里，仅“经援”即达15亿美元，平均每年1亿美元。当时，台湾经济正处于极端困难的状态之中，美援对台湾经济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具体的说，一是提供了大量物资，弥补了供应不足，基本上解决了50年代初期物资严重匮乏的状况；同时，通过设立“相对基金”，减少货币供给量，使台湾的通货膨胀率由1950年的400%降为1951年的66%、1952年的23%、1953年的8.8%，再降为1954年的2.4%。二是提供了资金，为台湾的资本形成提供了财源。据统计，1952—1965年期间，美援资金平均占台湾资本形成毛额的1/3。三是平衡了外汇收支。1971年以前，除个别年份外，台湾对外贸易年年逆差，主要是靠美援来弥补的。据一位外国学者估算，倘若没有美援，台湾到1995年也无法达到1964年的生产水平，就是说，台湾经济的发展要滞后30年。60年代中期以后，美援停

止，台湾财源仍感不足，缺乏建设资金。美、日等国，首先是美国，通过政府和银行贷款以及直接投资等形式，给予台湾资金。1966—1980年期间，输入台湾的资金约有53亿美元，相当于前15年美国“经援”总额的3.5倍，这些资金对台湾经济的起飞起了输血作用。

2. 安排为战争的供给基地。1965年，美国发动了侵越战争，此后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一直把台湾作为它的后方基地，这对台湾经济的起飞又是一副重要的催化剂。其作用有：①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都给予台湾大量的“特需订货”，并把大批侵越美军运往台湾休整。这既推动了岛内的生产，又增加了岛内的消费需求。岛内的许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服务业都有了很大发展。②扩大了出口，增加了外汇收入。美国的“特需订货”绝大部分都是输往南越的，据统计，在9年中台湾输往南越的物品共达5亿多美元，平均每年在5000万美元以上。由于台湾从南越的输入很少，9年累计顺差金额约在4.5亿美元左右，因而它对弥补1965—1970年间的外贸逆差（共6.8亿美元）以及使台湾对外贸易从1971年起转为顺差，都是起了作用的。

3. 提供了技术和市场。60年代，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纷纷致力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而把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这对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又苦于内部市场狭小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美、日等国扶持下，台湾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它们向台湾转移了大批技术。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8年，台湾核准的与国外进行技术合作的项目近3000件。此外，众多的外国投资企业也给台湾带来了大量技术。所有这些，为台湾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创造了条件。台湾的经济结

构就此发生了根本改变，从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出口加工经济迅速成长。1962—1972年期间，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1%，开创了经济增长率达两位数字的纪录。工业平均年增长18.5%，其中制造业在20%以上。对外贸易1972年的出口额比1962年增加了8倍以上。进入70年代，美国又加速了向台湾开放市场的步伐。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于1976年实行GSP制度，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美输出产品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其中，台湾是最大受惠地区。从1978—1982年，台湾在GSP免税项目下，输美金额占全部GSP免税进口之比率为26%，促成台湾对美输出大幅增长，顺差金额迅速扩大。70年代前半期，台湾对美顺差金额很小，而且有较大起伏，年平均为4亿多美元；70年代后半期，顺差金额有了扩大，年平均为20亿美元左右，但年度之间仍有起伏。80年代以后，顺差金额呈等加速度上升，1981年为33.93亿美元，3年后，大约增加3倍，为98.26亿美元；至1987年，竟高达160.09亿美元，为当年台湾从美国进口金额（76.28亿美元）的2.1倍。这是80年代台湾经济成长率（1980—1988年平均成长率为8.3%）仍然比较高的重要原因。

发展和依附的关系

台湾经济是在美、日等国扶持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台湾经济具有一种本质的特点——依附性。台湾当局讲自己是“三民主义经济”，我们讲它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说是带有中国地方特色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依附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附庸经济。主要表现为：

第一，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台湾在50、60年代大力发展轻纺工业，70年代才开始发展重化工业，这些工业建设主要限于官营企业，而80年代又没有什么新的发展。目前，台湾基础工业薄弱，又缺乏高科技工

业，它的制造业则主要是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加工装配型工业。以台湾的制造业结构与日本的制造业结构作一比较：1986年，台湾的纺织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9.8%，成衣及服饰品制造业为3.23%，塑胶制品制造业为8.70%，皮革毛皮制品制造业为1.58%，日本相应产业所占的比重为3%、1.5%、3.20%及0.41%，台湾分别为日本的3.27倍、2.15倍、2.72倍及3.85倍。相反，台湾一般机械制造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为3.22%，精密机械制造业为0.87%，运输工具（包含汽车）制造业为5.67%，日本相应产业的比重为9.16%、1.66%、13.76%，日本分别为台湾的2.84倍、1.9倍和2.43倍。由于基础工业薄弱，台湾工业生产中所需能源、原材料及机器设备大多依赖进口。以钢铁工业为例，1988年台湾进口钢材约200万吨。台湾能生产普通钢材，但数量尚不能满足需要；至于特殊钢材则大多依赖进口，特殊棒钢、不锈钢板、不锈钢盘元等物均制于日本。台湾的皮革毛皮制品业比较发达，但制革工业相当落后，所需生猪皮仰赖日本，生牛皮仰赖美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二，技术上受制于人。台湾从50年代开始，就从美、日等国引进技术，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实现技术扎根，对众多的关键技术仍不掌握，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殖民地。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在向台湾输出技术时，完全是有所选择、有所控制的，对不同层次的技术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①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输出一般技术，控制关键技术。玩具和自行车是台湾大量出口的传统产品，其制造技术从日本引进，但其中的关键技术一直由日本控制。如精密玩具的小马达和齿轮制造技术，台湾就不掌握，所有玩具厂所需要的此类零部件，都由日本进口。再如自行车的铝合金车圈、高级自行车的变速器，也需要从日本进口。②对重要产业要求建立加工装配基地，不允

许形成独立的规模经济。汽车工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台湾发展汽车工业有30多年历史，起初想发展自产汽车，对裕隆汽车公司保护了10多年，未能取得成效。继而想从日本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20万—30万辆的大型汽车厂，为此，和日本丰田公司谈判达数年之久，终究没有达成协议。目前，台湾汽车厂有10家之多，规模都比较小，技术上依附于他人，只是外国大汽车厂的海外加工装配基地，根本不能独立。最近，台湾当局不得不改弦更张，走所谓“国际分工”道路，发展汽车零组件出口，当个配角和下手。③对高级尖端科技拒绝输出。美国的许多尖端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借口与台湾没有签订高科技产品出口管理协定，控制向台湾输出有关技术。许多新兴的科技产业，如航空航天工业、新型材料工业、生物技术工业等等，台湾还付诸阙如。即以台湾引以为豪的，80年代以来发展比较迅速的资讯产业而言，也仍然处于对进口零组件进行装配的劳动密集阶段。

第三，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地区太集中。台湾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得相当的成功。事物是有两面性的，台湾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它的优点，但是，发展超过一定的限度，外贸依存度过高，就会变成为弱点。1988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90亿美元；同年，对外贸易总额为1102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2.6%。其中，进口金额为496.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1.7%；出口金额为605.87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9%。上述数字，充分表明了台湾经济与国际市场联系的紧密程度，国际市场任何轻微的变化，都会给台湾经济带来巨大的震动。不仅如此，台湾对外贸易的地区集中度也特别高。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一直以日本占首位，占进口总额的30—40%；出口则以美国为最大市场，占出口总额的40—50%，近几年有所下降，1988年仍

占38.7%。长时期来,台湾主要是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零部件及大量原材料,加工成品后引销美国,是日本—→美国这个经济通道中的中继站。

综上所述,台湾的工业在供——能源、原料、机器设备依赖国外供应,产——生产过程中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销——大量产品销售依赖海外市场,三个环节上都不能自立,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

发展与危机的关系

台湾经济是附庸经济,其中,隐藏着深刻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矛盾逐渐加深。进入8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台湾对美贸易顺差剧增,台美矛盾日益突出,美国在经济上已不愿意再无条件地扶持台湾,如取消了对台湾进口商品的关税优惠待遇,迫使台币大幅升值,要求台湾向美国开放岛内市场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当局取消了长达40多年的戒严令,岛内各种被压制的矛盾一下子迸发出来,如劳资争议急剧增加,环保意识强烈高涨。这一切,使台湾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内在的矛盾不断暴露,成为严重的危机。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工业升级步伐缓慢。台湾在60年代,依靠发展轻纺工业进军国际市场,实现了经济起飞。70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由于岛内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原有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削弱,台湾当局提出要发展基础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实现工业升级。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制订有关工业的发展规划;实行租税优惠和金融优待;积极引进技术和人才;推动开发研究;参与风险投资;等等。80年代,又提出策略性工业发展方案。10多年来,台湾当局苦心经营的工业升级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总体看,

进展缓慢。高科技产业只是资讯工业一枝独秀,而且技术上不能自主,其他各业均黯然,传统产业的改造步伐也很不理想,台湾的工业至今没有根本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形态。从台湾出口产品结构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据台湾“财政部”统计,80年代以来,台湾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4%左右,1986、1987两年更进一步上升为46%和47.7%。技术密集型产品几经起伏,从1981年的25.4%,缓慢上升到1987年的28.9%。值得注意的是,1987年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比1986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但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说明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需要使用较多的劳力。另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国民所得统计资料,1986年制造业附加价值率提升到31.6%以后,1987年开始回降,1988年再降为30.1%。人们心目中技术比较先进的电子电机工业,同期自29.4%降为24.4%,不仅降幅更大,而且其附加价值率远落在制造业平均附加价值率之后,表明上述工业只是进口零组件在岛内加工装配而已。

第二,投资意愿低落。有投入才能有产出。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投资率通常在30%左右。进入80年代,投资意愿一反常态,长期处于低落状态,投资率逐年下降。1980年为34.2%,1986年只有16.3%,1987年虽有回升,亦仅为18.7%。再以民间企业投资增长率为例,1988年为18.7%,1989年为5.4%,1990年估计为5.9%。相反,台湾的储蓄率近年来一直呈现高涨的趋势,1981年为31.8%,1985年为33.1%,1987年高达40%以上。1987年,储蓄率与投资率相比,高出22个百分点左右,出现大量的超额储蓄,存款余额高达4兆元新台币。

正当台湾的生产事业需要大量投资,以便迅速实现工业升级的时候,巨额资金却游离在生产事业之外,不少资金涌向商业和服

务业。据台湾“经济部”统计，1988年新设公司40896家，资本总额为4960亿元新台币。其中商业占238亿元新台币，居首位；制造业仅166亿元新台币，降为第二。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大量游资转向炒卖房地产及股票，造成近两年来房地产价格飞涨，股票市场畸形繁荣，与制造业的投资低迷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瞬息暴富”的现象不仅极大地打击了企业家的投资意愿，而且严重地腐蚀了广大劳工的劳动意愿。台湾的有识之士对此颇为忧虑，认为：“这种现象表面上欣欣向荣，实质上则是前途隐忧重重。”^①

第三，企业外移成风。近年来，由于台币大幅升值、劳工缺乏、工资成本上升、环保意识高涨、治安情况严重恶化、工业用地价格飞涨等等因素，台湾许多产业在岛内已无法维持，纷纷外移。目前，台湾产业外移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不仅是个别厂商外移，而且是行业集体外移。最近，台湾区织布公会理监事会议决定，由公会筹组“海外联合投资公司”，去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考察投资环境，拟在其中选择一处成立台湾“第一个海外织布工业专业区”。台湾区电工器材公会理事长谢来发表示：整合企业界力量，以团队方式赴外投资设厂，一向是同业公会理事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现在该公会已经集合数十家厂商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双溪大年工业区设置了台湾电子工业区。^②不仅是一种行业集体外移，而且是上下游产业配套外移。近二三年，原由台塑企业供给原料的塑胶三次加工工业，如制鞋、手提包等行业，约有三分之一的厂商来大陆设厂，这就带动了台塑企业也积极筹划来大陆投资，形成上下游产业配套经营。^③不仅中小企业外移，而且大企业集团也在外移。台湾的华夏集团、台塑集团、东帝士集团等等大型企业集团，近年来都积极策划去海外或来大陆进行投资，这一行动对台湾企业界震动很大。^④不仅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而且技术密集

型产业也在外移。资讯产业是台湾在80年代刚发展起来的明星产业，由于投资环境恶化，也被迫离岛出走。台湾著名的宏基电脑公司董事长施振荣表示：资讯业外移东南亚是不得已的做法。总之，现在台湾“产业界赴外投资或外移现象，已由过去的涓滴，形成目前的洪流而无法遏止”^④。

人们焦虑大批产业外流会形成怎样的后果？是否会出现产业空洞化？最近，台湾“行政院经建会”进行了一项关于《美日西德产业空洞化》的研究，认为台湾去海外投资为分工式投资，依据日、美、西德的经验，不致构成空洞化。但是，问题在于：^①日、美、西德工业基础雄厚，研究开发能力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同时，国内技术密集型产业能迅速成长。而台湾的工业基础薄弱，多系加工装配形态，研究开发能力很差，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岛内工业一时难以升级转型。^②日、美、西德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是由于这些产业部门的比较利益丧失，就其国内整个投资环境而言，仍比较好，企业愿意积极投资，迅速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出走后的空间。而台湾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因素，促使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企业投资意愿低落。许多外移企业在海外获得的利润汇回台湾后，不再进行投资，而转入股票及房地产市场，现有产业外移后形成的空间难以填补。

一方面，现有产业大批外移；另一方面，投资意愿低落，研究开发落后，技术人才准备不足，难以实现工业升级。这是一对尖锐而深刻的矛盾，其发展的后果将导致产业空洞化。台湾是海岛型经济，是加工出口型经济，工业是它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空洞化的出现，会给台湾经济带来致命的危机。

^①台湾《经济日报》1989年1月9日。

^②台湾《经济日报》1990年3月12日。